

20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的分析与反思

宋伟佳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7

【摘要】：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切入点，细致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得失。这次调整是国家根据发展需求对高等教育结构的直接规划，核心目标是搭建服务工业化建设的专才培养体系。短期内，通过整合教育资源，确实实现了人才培养的规模增长，也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初步建立打下了基础。但与此同时，调整也带来了一些深层问题，比如学科之间壁垒加重、人文教育被弱化，高校自身的自主发展空间也受到了限制。整体来看，这次院系调整既体现了高等教育配合国家战略发展的实用价值，也留下了值得反思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院系调整；制度变迁；结构变革；资源分配；管理转型

DOI:10.12417/2705-1358.26.03.058

20世纪50年代初，在政府牵头下，我国开展了高校院系调整，把全国约四分之三的院系，跨地区做了改组和合并，引导高等教育进入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培育专业人才的新轨道。尽管此后历经多次改革，但50年代初奠定的大学制度框架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追溯这一历史节点，深入挖掘其在复杂适应系统中的表现，对于理解高等教育制度演变和国家需求和学术自主之间的关系，都既有历史意义也有当代启示。

1 专才教育战略兴起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开启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变革。1950年，教育部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应紧密契合国家经济、政治及国防建设的实际需求^[1]，国家宏观战略对高等教育结构的进行积极引领，旨在通过行政统筹的高效手段，驱动高校转型为支撑国家战略目标的坚实阵地。外部导向成功促使高校这一复杂适应系统实现了功能与结构的优化调整，开启了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在适应性创新层面，院系调整通过构建以“专业化”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体系，精准对接了工业化初期的迫切需求。工业、师范等院校在制度指引下，实现了资源的战略性整合，目标直指培养具备实战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及下设的政法、财政学院成功承担起培养建设规划者的重任；国家集约化成立的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所专门学院，显著强化了专业理论的深度与技术应用的精度。与此同时，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综合大学也通过转向专才教育，实现了学术积淀向服务经济建设的实质性转化。这种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极大提升了教育产出的针对性，为新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从效能提升与结构重组的正向视角审视，制度干预带来的专业化重塑，实际上是高等教育体系为了追求建设效率而进行的精细化分工。理科与工科领域的深度细化，以及工业类专业

的精准设置，确保了有限的教育资源能够最大化地投向国家建设最需要的技术前沿^[2]，高度集约的培养模式，在极短时间内缓解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缺口。有研究者担忧，过多的专门学院和过于狭窄的专业设置在系统中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毕业生知识面变窄，社会适应能力不足，学科间的天然联系被隔阂取代。^[3]然而其是对学科多样性提出了更高的整合要求，形成的专业化矩阵显著增强了毕业生在特定工业领域的专业胜任力，实现教育资源与生产力布局的深度锚定。

这种结构性变革在宏观上圆满达成了国家赋予的战略使命，实现了对建设人才的快速吸纳与高效转化。当时高等教育着重强化科学技术教育，成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让大学助推社会发展的作用愈发凸显。

2 重塑学科结构与效能提升

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次深刻重塑。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一变革通过对综合性大学的职能优化与专业化重组，打破了旧有的学科壁垒，引导高等教育进入了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发展新路径。这一过程通过行政统筹与学术资源的精准配置，实现了教育资源从“分散消耗”向“集中攻关”的战略转移。

当时的综合大学虽与现代概念有所不同，但仍保持着文理支撑的学科基础。^[4]在专业化实力构建层面，院系调整对传统大学进行了科学的结构裁撤与合并，这在本质上是国家为了在特定领域快速形成突破而进行的减法与加法。当时，通过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知名高校的系科进行针对性调配，一批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专门学院脱颖而出。以复旦大学为例，其商、法、农等应用系科的调出，实际上是为相关领域的独立发展腾挪了空间，使资源能向国家最急需的特定方向高度集聚。各校通过规模化的资源整合，得以在保留核心优势的基础上，深耕特定学科领域，在短期内形成强大的

专业化人才培养矩阵,极大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建设的精准度与响应速度。

在科研功能的集中化与专业人才培养层面,院系调整推动了教学与科研职能的垂直化分工,形成了符合当时国情的高效运行机制。行政力量对学术功能的重新界定,将高校定位为支撑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人才供给基地,使教育体系能够全神贯注于实用性人才的速成培养。与此同时,通过单独设立专门的研究院所,国家构建了一套能够直接解决技术难关的科研体系。这种“科研在山地,教学在基地”的布局,虽然在形式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剥离,但在宏观上却实现了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的零距离对接。尽管统计数据 displays 1953年后培养出的科学家比例在特定统计范畴内有所波动^[5],但为国家大规模、批量化培养基础建设所需的“技术中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障,满足了新中国初期的燃眉之急。

总之,这场由国家主导的高校结构调整在宏观上圆满完成了国家赋予的政治与经济使命,通过牺牲一定的学科多样性,换取了人才培养的极高效率与专业化深度。它不光给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凑齐了急需的人才,还为现代高等教育靠统筹规划实现快速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也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调整学科布局、根据需求调整科研方向,都是为了让国家利益最大化、推动社会生产往前赶的必经之路。

3 资源分配的均衡初衷与马太效应

城市内每新增一个全国排名前十的学科,与该学科紧密相关的专利类别中的发明专利申请数与专利被引用数便会分别显著提升 33.6%和 64.7%^[6],高校学科建设对于推动城市内部与优势学科相关联的创新活动集聚的积极作用,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对于促进地区间发展平衡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在教育资源地域分配方面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尝试,其初衷是一次基于国家宏观战略的重大尝试,旨在打破高等教育过度集中于沿海大城市的旧格局。官方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沿海地区的科系向内地大规模迁移,试图构建“块状均衡”的分布。根据《关于一九五三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的总结报告》等文献记载,这种调整加速了内地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效率^[7],这一调整有效地缓解了高等院校过度集中于沿海和大城市,导致地区分布不均的问题,促进了内地教育的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的建设。

然而,高校资源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在外部政策冲击下表现出了复杂的反馈特征。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预期的块状均衡演变为向特定城市倾斜的点状集中趋势,武汉、西安、成都、兰州等城市成为了内迁系科的主要承载地,而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凭借其扎实的教育基础、区位优势及强大的资源吸纳能

力,成为资源汇聚的核心节点。这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原有资源优势地区在新的制度框架下依然保持着吸附力,导致资源并未如预期走向平衡,反而加剧区域内部的差距。

系统内部的适应性行为最终会引发了整体层面的失衡。沈登苗对三百余位科学家进行追踪研究,发现除了因特殊背景受益的东北地区外,全国高端人才分布呈现强者愈强结果^[8]。调整后,北京、上海两地的科学家数量不仅没有因“内迁”而减少,反而多了近两成,行政干预下的布局优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反而拉大了重点学校、尖端专业和高级人才在空间分布上的差距,破坏了大学的完整性,对高等教育的整体协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为后来的教育改革留下了关于制度设计与动态平衡的难题。

从想实现块状均衡到最后点状集中,其实就是国家想法和教育系统自身规律在较劲。它证明了仅仅依靠行政手段调整资源位置,很难完全抵消经济地理与历史积淀形成的资源惯性。马太效应不仅会干扰最初的均衡愿景,还会让人才与学科的分布在新的结构中形成新的壁垒,这也成为 50 年代院系调整在资源分配上留下的历史注脚。

4 管理模式转型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不仅是学科的重组,更是一场管理模式的变革。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受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改革的核心目的就是让教育系统全面服务于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因素深度融入到高校管理中,也让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

从实际成效来看,这一时期的管理改革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得很充分。依靠行政指令集中整合教育资源,虽然高校总数在调整后减少了超过一成,但资源的集中投放,使在校生数量实现激增,幅度达到 82.1%^[9],效率的提升在当时既符合政治需求,也贴合实际情况,短期内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输送了大量急需的专业人才,刚好满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需求。刘颖^[10]、贾佳^[11]等学者的研究也指出,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领域的介入,不仅在当时的历史节点上具有政治性,还展现了国家动员体制在教育领域的强大效能。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院系调整浪潮中,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从原本公立、私立及外国教会津贴办学的“三元并存”格局迅速向单一公立。这一调整旨在集中调配教育资源、提高使用效率,让每一分教育投入都能转化为服务国家的实际能力。以“五院四系”的形成为例^[12],国家通过对部分面临困境的私立大学进行合并与吸收,不仅保护这些院校的优质师资,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套统一化的教学管理体系。统一的教学大纲与计划,守住人才培养的基本质量,让高等教育能够有序、规范运转,为大规模人才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

管理模式的转型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高校的顺畅指令传递,高校能够迅速响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把学科特色和地域优势转化为支撑国家建设的力量。这类高度集中的模式也对高校的传统自主权进行了限制,大学的自治权和教师的学术自由受到了明显约束。教育权力高度集中在政府手里,高校没法依据自己的历史积淀、学科特点和地域优势灵活规划发展,只能跟着行政指令走。这就让师生少了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空間,教育也慢慢变得只重实用。有些高校为了迎合意识形态,甚至不惜丢掉大学精神,让高等教育差点变成单纯的“政治和技能培训班”。管理模式的改变虽然短期实现了规模扩张,但从长远来看,可能打乱了高等教育作为知识殿堂的本质,对它的创新能力和学术底蕴埋下了隐患。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制度安排把大学紧紧纳入了国家发展大局,强化了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不仅完成了教育资源的国有化和标准化,还凝聚了全国的教育力量,让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大提升。

5 结语

从历史大视角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院系调整不只是重新排列了教育结构,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在特定历史阶段

做出的成功适应和战略选择。从政治和现实需求来说,这场变革刚好贴合了当时国家工业化的迫切需要,通过高效整合全国优质教育资源,打破了旧教育体系和社会生产脱节的问题,给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专业能力过硬的人才,实用价值和执行效率都很突出。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短时间内搭起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工、农、医、师这些关键领域形成了系统化布局,这份历史贡献是没法否认的。当然,靠行政力量推动的这种变革,在学科生态、学术传承和高校自主发展方面,也带来了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但正是这种让高等教育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尝试,开启了教育服务社会、支撑强国建设的探索之路。

高等教育要想发展得好,既得响应国家的宏观规划,也得遵循知识生产的自身规律。未来搞高等教育治理,我们应该借鉴院系调整中“协同发展”的经验,在保证行政效率和规模效应的同时,更重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传承好大学精神,这样才能在国家战略需求和教育本身的价值之间,找到一条更灵活、平衡且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子。

参考文献:

- [1] 马叙伦.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幕词[J].人民教育,1950(03):11-14.
- [2] 袁爽.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研究(1949-1957)[D].贵州财经大学,2017.
- [3] 王云峰,吴晓蓉.反思我国20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9,30(01):55-57.
- [4] 曾昭掄.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问题[J].人民教育,1952,(09):6-9.
- [5] 沈登苗.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J].大学教育科学,2008,(05):73-81.
- [6] 范剑勇,张丰,唐为.高校学科质量与区域科技创新[J/OL].世界经济,2024,(04):65-98[2024-08-21].
- [7] 李杨.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J].开放时代,2004(5):16.
- [8] 沈登苗.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J].大学教育科学,2008,(05):73-81.
- [9] [日]大塚丰著,黄福涛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10.
- [10] 刘颖.除旧布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高等教育的接管与改造[M].人民出版社,2010.
- [11] 贾佳.未竟的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次转型[D].南京师范大学,2021.
- [12] 王健.“五院四系”的由来与未来[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03):5-23.